

东盟国家对“四大全球倡议”的认知、考量与中国的推进路径

毕海东

摘要：通过将有关“四大全球倡议”的研究视角“回落”到东南亚区域层面，东盟国家对“四大全球倡议”的认知和考量得以呈现，即东盟国家对“四大全球倡议”形成了一个支持程度由高到低的认知谱系，双边关系、收益预期、大国竞争、领土争议构成了影响东盟国家对“四大全球倡议”认知的四个核心考量。其中，双边关系奠定认知基调，收益预期微调立场取向，大国竞争施加外部约束，领土争议触发安全疑虑。这四个核心考量相互交织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和多边互动结构之中，共同塑造了东盟国家对“四大全球倡议”的差异化、渐进式、情境化回应逻辑。对此，中国要结合东盟国家的不同认知和考量，精准优化“四大全球倡议”的推进路径，以增强其在东盟国家乃至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中的接受程度与落地效能，推动实现“四大全球倡议”的“在地化”。

关键词：“四大全球倡议”；区域回应；东盟国家；“全球南方”；“在地化”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6）05—0032—10

自2021年至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不同的国际场合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并就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作出重要论述。^①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维护大国关系总体稳定，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②因此，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工作重点，也是中国学界需要跟进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将从全球倡议的国际传播视角出发，分析东盟国家对“四大全球倡议”的认知和考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东盟国家推进“四大全球倡议”落实的路径。

一、“四大全球倡议”国际传播的研究现状

“四大全球倡议”自提出以来便成为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焦点议题。学界围绕其叙事建构、话语权力和传播策略展开了多层次探讨，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与现实关怀的研究成果。

基金项目：本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中国在东南亚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机遇、挑战与对策”（项目编号：ZKJC262401）资助。

作者简介：毕海东，男，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研究。

① 习近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求是》2025年第20期。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

在叙事建构层面,学界关注“四大全球倡议”如何超越西方话语霸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叙事体系。谢清果等从“战略叙事”理论出发,指出中国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应构建体系叙事、身份叙事与议题叙事三位一体的内容框架。^①这一分析揭示了“四大全球倡议”的传播不是孤立的政策宣示,而是一套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意义系统。与此同时,学界也强调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传播智慧对叙事建构的深层滋养。谢清果等提出的“共生传播观”又认为,“四大全球倡议”分别体现中华文明的“人文情思”“生命关怀”“天下情怀”与“治理智慧”。^②这种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当代传播话语的尝试,为理解倡议的独特性提供了文化解释路径。

在话语权力维度,学界直面“四大全球倡议”国际传播面临的现实困境,认为西方话语霸权构筑的认知障碍是核心挑战。王明国对全球安全倡议国际认知的实证分析更为具体:国际社会存在积极响应、谨慎乐观、中立观望、质疑担忧、否定抵制五派论调,负面认知的根源既包括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内在缺陷,也涉及倡议作为新理念有待具体化的现实。^③陈崎等从文化维度进行了进一步补充,认为中外跨文化沟通中的语境差异、语义转换的精准性欠缺、话语表述的生动性匮乏,共同导致倡议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困境。^④这些分析表明,倡议的国际传播已超越单纯的信息传递问题,演变为一场围绕命名权、释义权与认知框架的深层博弈。

在传播策略层面,学者们提出了多维度的应对方案。一是“复调传播”策略,强调构建官方、媒体、智库、民间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声的格局,以“和而不同”的对话逻辑取代单一声音的说教逻辑。二是“跨媒介叙事”策略,主张发挥不同媒介平台的叙事特性,通过游戏、短视频、影视作品等数字载体实现倡议理念的具象化传播。^⑤三是国际组织路径的利用,周英等认为联合国、东盟、非盟等多边机制是倡议规范化、议程化与制度化的核心平台,中国应借助国际组织网络扩散理念共识。^⑥此外,部分研究开始引入实证方法检验倡议的传播效果。卢明江等运用结构主题模型对“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全球南方”媒体更关注合作议题、情绪偏积极,而“全球北方”媒体更侧重大国竞争框架、情绪偏质疑。^⑦这种基于数据的分区城比较研究,为差异化传播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经验依据,也标志着该领域研究从规范论述向实证分析的转型。

综合来看,当前研究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一是理论资源多元,叙事学、话语理论、传播符号学、场域理论等被广泛运用,分析框架日趋精密;二是问题意识明确,对西方话语霸权、认知战、文化差异等结构性困境有清醒认识;三是策略导向突出,绝大多数研究落脚于“如何提升传播效能”的实践关怀。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若干值得反思的不足。其一,多数研究停留在“应然”层面的策略倡导,但在何种机制下有效、何种情境中失灵,尚缺乏实证检验。其二,研究对象高度集中于“三大全球倡议”,对2025年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的传播研究相对薄弱,系统分析“四大全球倡议”协同传播的成果更为鲜见。其三,研究视角以“传者中心”为主导,侧重于“中国如何说”,而对受众“如何接受”“如何解读”“如何转化”的接受度研究明显不足。其四,区域国别维度的精细化分析有待加强,虽有研究区分了“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认知差异,但对东盟、非洲、拉美等特定区域的深入比较尚不充分,这恰恰为后续研究留下了空间。

① 谢清果、胡羽佳:《“三大全球倡议”国际传播的和平发展叙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② 参见谢清果、杨婧晨:《中华文明共生传播视域下“三大全球倡议”的实践、历史和理论逻辑》,《未来传播》2024年第6期;谢清果、胡建强:《全球治理倡议的中华文明正名叙事与国际传播逻辑:基于文明共生传播观的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

③ 王明国:《国际社会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多重认知与中国的推进策略》,《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3期。

④ 陈崎、陆春霖:《全球文明倡议:话语意涵、传播困境与突围策略》,《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⑤ 谢清果、胡羽佳:《“三大全球倡议”国际传播的和平发展叙事》。

⑥ 周英、黄忠:《四大全球倡议的国际组织推进路径》,《区域国别学刊》2026年第2期。

⑦ 卢明江、张自中、史安斌:《中国发展故事的国际传播与规范性力量构建——基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报道的比较分析》,《对外传播》2025年第12期。

东盟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其成员国对“四大全球倡议”的认知既受全球性话语博弈的影响,又呈现相应的区域特征。因此,在既有研究揭示的宏观困境与策略框架下,深入东盟国家的具体语境,考察其对“四大全球倡议”的认知和考量,并据此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推进路径,便成为一项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工作。

二、东盟国家对“四大全球倡议”的认知和考量

在“四大全球倡议”被先后提出以后,东盟国家对“四大全球倡议”表达了不同的认知,这些认知形成了一个支持程度由高到低的谱系。同时,东盟国家对“四大全球倡议”持有不同认知的背后,也有着多方面的考量,这些考量呈现了一幅不同权衡并存博弈的考量图景。

(一) 双边关系奠定认知基调

在东盟国家中,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缅甸、文莱等八国都已经与中国达成了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也都对“四大全球倡议”表达了支持立场。而且,这八国对“四大全球倡议”的支持整体上贯穿于“四大全球倡议”提出的全过程,并将对“四大全球倡议”的支持放在了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之下。东帝汶与中国在2024年7月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朝着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迈进^①。在当时,东帝汶也表达了对“三大全球倡议”的支持和认可。新加坡和菲律宾到目前为止没有与中国达成或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大方向的共识,也都对“四大全球倡议”持保留态度。因此,是否与中国达成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成为东盟国家对“四大全球倡议”表达认知的重要考量因素。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坚持不结盟政策的基础上,同许多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发展伙伴关系的最高形式,因而,部分东盟国家与中国达成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本身就标志着彼此之间的关系发展和互信程度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在此情况下,这些东盟国家势必会对中国提出的符合现行国际规范的重大全球倡议表达支持,这也是与中国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同时,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崇高目标,“四大全球倡议”则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和战略引领。^②这就意味着东盟国家与中国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必然要通过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来实现,这些东盟国家对“四大全球倡议”表达支持是与中国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二) 收益预期微调立场取向

在东盟国家中,印尼、泰国和越南对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支持体现出明显的立场差异。具体来说,2023年10月18日,中印尼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印尼表示将继续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工作,同中方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进一步深化发展合作,开展更多务实合作项目,同时与中方就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加强沟通和探讨合作。^③2023年10月19日,中泰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报,泰方表示愿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与中方探讨在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下开展合作。^④2023年12月13日,中越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越方表示愿主动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框架内符合越南能力、条件和需求的具体项目合作,共同落实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与中方探讨在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4年7月30日。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人民日报》2023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5年,第63—66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政府联合新闻公报》,《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0日。

明倡议框架内的合作。^①在全球治理倡议被提出以后,三国对全球治理倡议的支持也基本上以口头表态为主,尚无具体合作方向。新加坡到目前为止仅仅对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表达支持,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自由贸易^②,而没有对其他三大全球发展倡议进行表态。应该说,对“四大全球倡议”的收益预期构成了这些东盟国家在“四大全球倡议”之间表达不同支持立场的关键考量因素。

在“四大全球倡议”中,全球发展倡议不涉及高政治敏感领域,没有过多的国家安全或意识形态包袱。同时,全球发展倡议明确提出了包括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和数字经济等在内的八大重点合作领域。大多数东盟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赤字巨大,所以普遍坚持发展导向和发展优先,希望与中国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以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因此,全球发展倡议对东盟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其他三大全球倡议属于高度敏感的政治,东盟国家围绕这三大领域的分歧也比较多。一些东盟国家认为,全球安全倡议提及的安全不可分割和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的解释和运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③如果中国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安全不可分割和重视中国合理安全关切为由,限制东盟国家与美国开展安全合作,那么,这些东盟国家会感到自己的战略自主权受到制约,这显然会减损它们的安全收益,使它们对全球安全倡议持谨慎态度。同时,一些东盟国家担心,全球文明倡议的“过度”亚洲色彩会使其落入“亚洲—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④这显然降低了希望在政策上保持灵活性的东盟国家的收益预期,使这些东盟国家对全球文明倡议持谨慎认知。最后,在一些东盟国家看来,中国会“选择性地”执行或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理念,这也会降低这些国家对全球治理倡议的收益预期,使其对全球治理倡议持谨慎立场,避免过度卷入其中。^⑤对全球发展倡议与其他三大全球倡议的不同收益预期在印尼、泰国、越南和新加坡的认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这些国家在“四大全球倡议”之间表达了不同的支持立场。

(三) 大国竞争施加外部约束

中国在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以后会主动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宣介,以期获得其他国家的积极回应,并在此基础上推进落实。在东盟国家中,老挝、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基本上在“四大全球倡议”被分别提出以后,就对倡议表达了支持立场。然而,印尼、泰国和越南对“四大全球倡议”的表态整体上相对较晚,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内部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权衡过程。新加坡、文莱和东帝汶与中国合作的领域已经涵盖了“四大全球倡议”所涉及的内容,却对相关全球倡议的表态同样相对较晚。可以说,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选边站队压力成为这些东盟国家对“四大全球倡议”表态时间较晚的主要考量因素。

保持大国平衡是印尼、泰国和越南外交政策的显著特征。印尼奉行“自由—积极”的外交政策,不在世界强国之间选边站队,但同时努力在外交上发挥作用,以“自由—积极”外交政策为指引,走不结盟的道路,主张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以维护自身能动性。^⑥泰国外交政策以灵活性和实用性为特征,体现为主动利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4日。

②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中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11月18日, 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11/t20221118_10977296.shtml, 2025年7月19日;《李强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会谈》,中国外交部网站,2025年10月26日, https://www.mfa.gov.cn/zyxw/202510/t20251026_11740778.shtml, 2025年10月28日。

③ Hoang Thi Ha (2023). *Why Is China's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Cautiously Perceived in Southeast Asia?* Retrieved on 24th Sept 2025 from <https://www.iseas.edu.sg/articles-commentaries/iseas-perspective/2023-11-why-is-chinas-global-security-initiative-cautiously-perceived-in-southeast-asia-by-hoang-thi-ha/>.

④ Hoang Thi Ha (2023). *The Global Civilisation Initiative: Are 'Asian Values' Back with a Chinese Vengeance?* Retrieved on 28th Sept 2025 from <https://fulcrum.sg/the-global-civilisation-initiative-are-asian-values-back-with-a-chinese-vengeance/>.

⑤ Shannon Tiezzi (2025). *As China Seeks to Remake Global Governance, Its UN Diplomacy Is Changing*. Retrieved on 4th Oct 2025 from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9/as-china-seeks-to-remake-global-governance-its-un-diplomacy-is-changing/>; Muhammad Zulfikar Rakhmat (2025). *Indonesia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Walking the Tightrope*. Retrieved on 4th Oct 2025 from <https://blogs.lse.ac.uk/cif/2025/10/01/indonesia-and-the-global-governance-initiative-walking-the-tightrope/>.

⑥ Gregory B. Poling and Andreyka Natalegawa (2025). *Between Two Reefs: Indonesia's 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trieved on 10th Dec 2025 from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etween-two-reefs-indonesias-strategic-culture-twenty-first-century>.

用矛盾，善于自我保全，在依托强权的同时又多边下注。近年来，泰国更是坚持大国平衡政策，在安全上维持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在经济上加强与中国的全面合作。^①越南坚持全方位和多样化的外交路线，近年来提出了“竹式外交”的概念，将竹子根坚、身实和枝柔的特性融入外交理念中^②，主张“以不变应万变”，实施灵活务实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所以，印尼、泰国和越南并不会对中国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立即表态，而是进行相应的权衡，避免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选边站队压力冲击其大国平衡政策。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选边站队压力对东盟小国的影响更为明显。一般来说，结盟、平衡或中立是小国的常规战略选择。^③但是，在东南亚地区政治中，小国与大国结盟的代价太大，选择中立的难度也很大。在此情况下，小国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是一个相对较优的选择。新加坡、文莱和东帝汶在东盟国家中都属于小国。因而，三国都尽可能保持与中美两国的平衡，避免过度依赖某一大国而引起另一大国的不满。同时，三国也都利用其战略位置和经济资源，结合细致入微的外交手段，在不融入大国战略话语的前提下，与大国开展灵活而务实的合作。^④因此，新加坡、文莱和东帝汶对相关全球倡议采取了正常合作但较晚表态的实用主义立场。

（四）领土争议触发安全疑虑

菲律宾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被提出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对这两大全球倡议进行表态。直到2023年1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才对这两大全球倡议表达合作态度。访问期间，中菲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中方欢迎菲方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双方将在双边层面和区域层面围绕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合作，一致同意就全球安全倡议加强沟通协商和探讨互利合作。^⑤在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被提出以后，菲律宾没有再对这两大全球倡议进行表态。因此，在东盟国家中，菲律宾对“四大全球倡议”的支持程度最低，而南海问题争议引起的对华威胁认知也构成了菲律宾对“四大全球倡议”支持程度最低的首要考量因素。

中菲之间的南海问题争议引起的对华威胁认知首先使菲律宾无法对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表示认同。在菲律宾看来，中国在南海“威胁和恐吓”其他主权声索国的行为与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的安全理念和原则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⑥进而，菲律宾的对华威胁认知使其对中国的信任度处于低位，在此情形下，菲律宾自然也无法对中国提出的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文明倡议和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全球治理倡议表示支持。对于全球发展倡议来说，虽然全球发展倡议本身不涉及高政治的敏感领域，而且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但是，菲律宾担心支持和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会加深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继而，在中菲南海问题争议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对菲律宾进行经济制裁，菲律宾将会非常被动。^⑦为此，菲律宾选择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的经济关系，以寻找替代经济机会，实现经济合作伙伴来源的多元化。所以，中菲之间的南海问题争议引起的对华威胁认知影响到了菲律宾对“四大全球倡议”的整体立场。

三、东盟国家重点媒体和重点人群对“四大全球倡议”的认知和考量

自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以来，东盟国家媒体对其反应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立场分化与深度不足等复杂特征。报道态势首先表现为针对不同全球倡议的结构性失衡。其中，全球发展倡议因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衔接，直接关乎区域经济复苏、基础设施改善及减贫合作，成为东盟国家媒体关注的

① Pongphisoot Busbarat (2024). “Bamboo Stuck in the Chinese Wind”: The Continuing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a Factor in Thailand’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46(1), 125—146.

② 王琛：《越南“竹式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5期。

③ 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④ Hafiz Hashim. et al. (2024). *Regional Responses to China’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trieved on 21st Aug 2025 <https://fulcrum.sg/aseanfocus/regional-responses-to-chinas-community-of-shared-future-for-mankind/>.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1月6日。

⑥ Hoang Thi Ha (2023). *Why Is China’s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Cautiously Perceived in Southeast Asia?*

⑦ Hafiz Hashim. et al. (2024). *Regional Responses to China’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焦点，普遍被视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机遇。^①全球安全倡议则因触及南海争端及中美博弈等敏感议题，引发了区域性的战略焦虑。相比之下，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治理倡议由于理念相对抽象，缺乏与东盟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连接点，导致其在媒体议程中被边缘化，鲜有独立深度解读，多局限于官方通稿的引述与特定论坛的宏观讨论，尚未形成有效的舆论共鸣。

同时，在报道立场与叙事框架上，东盟国家媒体呈现出官方积极、民间审慎的分化格局，并深受外部环境影响。在老挝、柬埔寨、泰国和印尼等亲华或务实派政府主导的媒体中，报道基调较为积极，倾向于将“四大全球倡议”视为深化双边合作、获取发展红利的政治框架，强调中国方案的正面效应。^②然而，在新加坡、菲律宾、越南及印尼的独立媒体和精英舆论场中，审慎、怀疑乃至批判的声音仍占据主导。^③这种分歧背后是地缘政治滤镜的深刻影响：西方主流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将中国的倡议置于“威权扩张”与“规则挑战”的对立叙事中，使得东盟精英阶层在引用信源时往往不自觉地代入西方视角^④，将全球发展倡议视为经济扩张工具，将全球安全倡议视为地缘安全威胁。同时，媒体往往将“四大全球倡议”置于中美博弈的宏大框架下进行解读，忽视了东盟国家作为战略自主主体的独立视角，导致报道呈现出碎片化特征，难以形成系统、理性的认知图景。

东盟国家重点人群对中国“四大全球倡议”的认知呈现出显著的“温差”与“分层”特征。在经济发展领域，全球发展倡议获得了东盟国家官方、商界及智库最广泛的积极回应，被视为疫后经济复苏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助力。然而，这种热情中夹杂着认知的模糊性：许多东盟决策者和民众倾向于将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混为一谈。^⑤这种认知混淆虽未削弱合作的意愿，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全球发展倡议作为独立外交理念的辨识度。与此同时，全球治理倡议在东盟国家精英阶层中引发了高度共鸣，其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和“真正的多边主义”与东盟长期奉行的“东盟方式”及不干涉内政原则高度契合，被视为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有力工具。然而，如前所述，全球治理倡议因其议题过于抽象和专业，在普通公众和商界中几乎处于“认知真空”状态。相比之下，全球文明倡议在价值观层面获得了东盟社会的普遍认同，各国领导人多次盛赞其尊重文明多样性的理念，青年群体通过各类人文交流活动也对“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了初步感知。但全球文明倡议在实践层面仍显模糊，东盟方面缺乏清晰的路径来理解如何将宏大的文明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合作项目。

与其他三大全球倡议相比，全球安全倡议面临着东盟各界最为严峻的“信任赤字”。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的权威民调显示，东盟精英对全球安全倡议能否为地区带来实质性益处的信任度不高。^⑥对于普通公众和青年而言，虽然他们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条文知之甚少，但受主流媒体、历史记忆及南海冲突新闻的影响，普遍对中国在安全领域的意图持有负面刻板印象，使得全球安全倡议在东盟社会层面的认知基础极为脆弱。即便中国不断强调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核心作用，但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本身及东盟国家媒体提出的“军事扩张”叙事，往往让其感到战略空间被挤压，而非获得安全保障。

四、中国在东盟国家推进“四大全球倡议”落实的路径

对“四大全球倡议”的不同认知和考量反映了东盟国家在重大全球性议题上的共识和分歧，因此，

① 《东南亚媒体：中国经济发展对区域将产生深刻影响》，《中国青年报》2026年3月8日。

② *GGI hailed by Asian media in Kunming*, Retrieved on 6th September 2025 from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509/06/WS68bb87a7a3108622abc9f318.html>.

③ Hoang Thi Ha (2023), *Why Is China's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Cautiously Perceived in Southeast Asia?*

④ Qiong Dang, *Research on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ASEAN in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5, 10.

⑤ Hoang Thi Ha (2023), *Why Is China's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Well Received in Southeast Asia?* Retrieved on 24th April 2026 from <https://www.iseas.edu.sg/articles-commentaries/iseas-perspective/2023-9-why-is-chinas-global-development-initiative-well-received-in-southeast-asia-by-hoang-thi-ha/>.

⑥ Sharon Seah. et al. (2023),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3 Survey Report*, Singapore: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36.

中国在东盟国家推进“四大全球倡议”的落实必然要考虑前述东盟国家及其重点媒体和重点人群的认知和考量,积极对接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发展战略、合作机制和规范认知,在此基础上对“四大全球倡议”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形成一个全面且系统的推进路径,最终实现“四大全球倡议”在东南亚的“在地化”。

(一) 分类施策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

当前,东盟国家与中国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方面呈现出不同的进展,因而,中国要分类施策,统筹推进与东盟国家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在已经与中国达成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共识的东盟八国中,老挝和柬埔寨又走在了与中国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前列,这表现为两国已经与中国分别签署了两份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行动计划,而其他国家还停留在与中国签署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的阶段。签署行动计划标志着老挝和柬埔寨将与中国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意愿转化为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生态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而这些合作反过来也为两国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提供了方向和指引。因此,中国深化与东盟八国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可以将中老和中柬双边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作为范例,基于各自的资源禀赋与利益关切,推动东盟其他六国加速完成由联合声明向具体行动计划的转型升级,并将“四大全球倡议”的理念原则和合作重点融入行动计划中,使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与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东帝汶已经与中国签署了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但从联合声明的表述上看,东帝汶实际是同中国确认了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这跟同中国达成了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仍然有所区别,因而,东帝汶对“四大全球倡议”的支持程度也同前面八国有所不同。对此,中国宜强化与东帝汶在各领域各层级的战略性与功能性对接,最大限度地挖掘相互间的合作空间和合作潜力。具体来说,双方应继续落实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具体合作规划,并通过教育、青年、体育和地方交流等多维度密切双方友好交往的民意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加强与东帝汶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带动该国对“四大全球倡议”的支持程度再上新台阶。对于新加坡和菲律宾,中国要通过加强与两国的既有合作和寻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两国治理理念的相通之处,不断积累与两国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条件。在与新加坡合作方面,中国应继续同新方深化发展规划对接,积极培育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发展等前沿领域合作,使中新关系切实体现命运与共的深远价值。在与菲律宾的关系层面,中国应在农业、基建、旅游、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为菲律宾提供更多的开放发展机遇,进一步密切两国的经济与社会联系,使菲律宾切实感受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长期利好。在此基础上,中国要稳步提升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定位,争取与两国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上实现突破,推动“四大全球倡议”在所有东盟国家全面落地。

(二) 整体提升倡议收益预期

在“四大全球倡议”中,全球发展倡议具有低敏感和高收益并存的特性,因此,中国宜主动对接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发展战略,巩固东盟国家对全球发展倡议的收益预期,使其在“四大全球倡议”的落实过程中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具体来说,中国可以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支持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助力实现《东盟共同体愿景 2045》,在促进区域合作和东盟一体化的同时增进东盟国家对全球发展倡议的接受度。同时,东盟推出的“东盟印太展望”提出了四大优先领域合作,即海上合作、互联互通、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及其他领域合作^①,这些合作领域与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的八大重点合作领域有很多重叠的部分。因此,中国可以推动全球发展倡议与“东盟印太展望”对接,实现二者的协同增效。在国家层面,中国可以通过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与东盟国家加强在全球发展倡议八大重点领域的合作,用好中国—东盟共同发展专项贷款、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

^①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Retrieved on 22th Dec 2025 from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_FINAL_22062019.pdf.

基金，尽快实现早期收获，增加东盟国家参与全球发展倡议的获得感。

对于全球安全倡议，中国要更多地从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而非绝对安全和霸权安全的角度向东盟国家进行宣介，表明全球安全倡议具有共生性和包容性而非单边性和约束性，从而缓解东盟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提到的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和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所持有的疑虑。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按照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则，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支持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在开展联演联训、应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维护海上安全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东盟国家参与全球安全倡议获益的能见度。对于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应避免将全球文明倡议“地方化”为中国文明倡议或亚洲文明倡议，防止出现全球文明倡议与西方文明理念的二元对立，进而让东盟国家陷入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在此条件下，中国应保持与东盟国家各层级众多双边对话交流，支持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加强双方在教育、文化、旅游、媒体、青年、智库和地方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更多打造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等人文交流旗舰项目，增加东盟国家对全球文明倡议的认同感。对于全球治理倡议，中国宜针对一些东盟国家所认为的中国“选择性地”执行或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理念，阐明事实真相，解释中国立场，辨析落实真伪，从而消除东盟国家的误解。在此基础上，中国要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数字治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多边机制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提升东盟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让东盟国家切实感受到参与全球治理倡议带来的积极变化和实际受益。

（三）全面淡化倡议竞争色彩

中国在东盟国家推进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要尊重东盟在不断演进的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主导的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机制。在此前提下，中国可以将“四大全球倡议”的核心理念与东盟主导的合作机制进行深度嵌套，把倡议所蕴含的发展优先、安全合作、文明互鉴、治理协作等核心理念内化为其议事规则和讨论主题，转化为其制度安排和行动纲领，从而提升这些合作机制的承载效能，推动这些合作机制成为倡议理念的“放大器”和“执行器”。与此同时，中国还应将“四大全球倡议”的理念原则与东盟既有规范认知进行充分对接，提高“四大全球倡议”在东盟既有规范认知中的融入度。其中，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体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倡导的发展主义理念。2012年，东盟国家在第21届东盟峰会上签署的《东盟人权宣言》强调了东盟各国人民享有的“发展权”，并在其治理实践中将实现经济发展置于实现公民政治权利之上。^①因此，全球发展倡议可以与东盟国家重视发展和强调“发展权”的既有规范认知进行对接。

全球安全倡议与东盟国家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东盟方式”在内涵要义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全球安全倡议可以与东盟国家所秉持的以对话和协商为基础的“东盟方式”进行对接。“亚洲价值观”是由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凭借其经济上的成功而提出的，反映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自觉，也驳斥了当时西方所宣扬的“历史终结论”以及西方所谓民主和人权的“普世性”。因此，全球文明倡议可以与东盟国家提出的倡导不同文化包容共存和反对单一文明优越论的“亚洲价值观”进行对接。东盟国家的全球治理观强调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的治理原则、重视协商与关系的软性治理机制、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治理路径^②，因此，全球治理倡议可以对接东盟国家的全球治理观，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进而，通过加强“四大全球倡议”与东盟主导合作架构的嵌套及既有规范认知的对接，中国可以找到双方的相通性，淡化“四大全球倡议”的战略意涵和竞争色彩，降低东盟国家在对“四大全球倡议”表达支持时面临的选边站队压力。

（四）尝试运用倡议理念解决南海问题

长期以来，国际舆论习惯于从地缘政治和传统安全的视角看待南海问题，将南海问题贴上“国际冲

① ASEAN Human Rights Declaration. Retrieved on 28th Dec 2025 from <https://asean.org/asean-human-rights-declaration/>.

② 吴志成、李颖：《全球治理的东盟视角与实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6期。

突热点”“领土主权争端”等标签。事实上，除了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归属问题，南海问题还涉及渔业资源利用、海洋环境保护、航道安全治理、海上联合搜救、跨国犯罪处置等非地缘政治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因此，从超越地缘政治和传统安全的视角看待南海问题已经成为时势所需，这也构成了南海沿岸国围绕南海开展合作的前提条件。“四大全球倡议”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的维度提出了应对世界变局的中国方案，同时也在一般意义上提供了一种分析和解决国际合作难题的综合思路。南海问题正是这样一种同时涉及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合问题，可以尝试从“四大全球倡议”的理念中探索解决路径。

中国与南海其他沿岸国首先可以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框架下，围绕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的重点合作领域开展合作，着重加强在蓝色经济与海洋可持续发展、互联互通与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与智慧海洋转型、气候适应与海洋清洁能源开发等方面的合作，逐步构建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形成以南海为纽带的地区发展网络。其次，中国与南海其他沿岸国可以优先围绕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航道安全治理、海上联合搜救、跨国犯罪处置等，开展功能性合作，形成“信任累积效应”。在此基础上，各方要完善双多边危机管控机制，加强海上执法机构间的合作，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彼此之间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的最终解决积累经验和创造契机。再次，中国与南海其他沿岸国不仅可以联合开展南海文明研究，共同梳理环南海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充分展示南海文明多元共生的特质，还可以合作开展水下考古，建立南海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机制。此外，各方还可通过青年交流、教育合作、智库研讨等方式，构建多层次人文交流网络，共同书写和传播南海和平、友谊、合作的新叙事。最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可以在已完成案文三读的基础上，以行动为导向，争取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构建一个基于全球治理倡议核心理念的南海区域治理新格局。总之，中国可以推动“四大全球倡议”在解决南海问题上先行先试，使东盟国家更加积极主动地接受“四大全球倡议”。

（五）统筹推进倡议差异化传播

针对全球发展倡议认知度较高但辨识度不足的问题，中国需明确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补关系，突出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独立价值，可通过发布《中国—东盟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清单》，聚焦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民生议题，以具体项目案例展现倡议的实际成效，增强民众获得感。对于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理念抽象、落地难”的困境，中国应推动“理念项目化”，如设立“中国—东盟文明对话基金”“青年领袖治理研修计划”，支持联合考古、非遗保护、高校课程共建等可触达民众的软性合作，使文明互鉴和治理合作从口号变为体验。同时，中国可借助东盟国家本土智库和媒体制作多语种短视频、播客、图文故事，用本地话语讲述“中国倡议如何助力本地发展”。中国还应加大对东盟国家的公共外交投入，支持东盟本土智库开展独立影响评估，邀请东南亚记者和青年领袖访华参与维和、护航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用一手见证打破负面刻板印象。

在此基础上，中国应主动支持独立学者、民间组织、项目受益者发声，建立“中国—东盟倡议观察员网络”，邀请东盟记者和青年博主实地参访中老铁路、中企援建学校等项目，形成第一手报道素材，鼓励中国智库与东盟国家知名智库开展联合研究，发布涉及“四大全球倡议”的区域影响评估报告，对冲“威权扩张”等负面叙事。同时，中国要加强与新加坡《海峡时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等独立媒体的合作，提供深度背景资料与专家访谈，推动报道从“宏观批判”转向“微观分析”。面向精英阶层，中国可通过“中国—东盟高级别战略对话”“青年政治家论坛”等平台，系统阐释四大全球倡议的内在逻辑与协同效应；面向青年群体，中国要扩大“中国—东盟青年领袖计划”“数字丝绸之路创新大赛”等品牌项目，以参与式体验消解刻板印象；面向商界，中国可发布《“四大全球倡议”商机指南》，明确绿色基建、数字贸易、碳市场等领域的合作机会，激发合作内生动力。

综上所述，“四大全球倡议”是中国面向世界提出的重要公共产品，其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与落地是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凝聚发展共识、协调安全利益、深化文明互鉴、完善区域治理的重要契机。东盟国家对“四大全球倡议”的认知和考量，既因自身发展阶段、对华关系定位、内外战略选择的不同呈现出明显差异，也整体呈现出“认可发展收益、担忧安全绑定、期待文明交流、关注治理权责”的分层特征。这要求中国在推进倡议落实的过程中，既要坚持东盟中心地位，尊重东盟各国的差异化需求，也要找准利益契合点，以点带面、循序渐进推动“四大全球倡议”协同落地。从长远来看，“四大全球倡议”的核心理念与东盟的发展需求、治理传统、合作愿景高度契合，只要中国坚持以互利共赢为出发点，以务实合作为抓手，稳步消除误解、凝聚共识，就一定能推动“四大全球倡议”真正融入东盟区域合作进程，为中国—东盟国家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The Perceptions and Considerations of ASEAN Countries Regarding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and China’s Advancement Paths

BI Hai-do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By bring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back to the regional level of Southeast Asia, this study reveals the perceptions and considerations of ASEAN countries regarding these initiatives. ASEAN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a range of perceptions toward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ranging from higher to lower levels of support. Bilateral relations, expected benefits, great-power competition,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constitute the four core considerations shaping ASEAN countries’ perceptions of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Among them, bilateral relations establish the fundamental tone of perceptions; expected benefits fine-tune policy orientations; great-power competition imposes external constraints;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trigger security concerns. The four considerations are linked with th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interaction structure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jointly shaping ASEAN countries’ differentiated, gradual, and context-dependent response logic toward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In response, China should optimize the paths for advancing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in a targeted manner by considering the diverse perceptions and considerations of ASEAN countries. This would enhance their acceptance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among ASEAN countries and the broader “Global South” and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Keywords: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Regional Responses, ASEAN Countries, “Global South”, “Localization”

[责任编辑：陈慧妮、赵蔚平]